

神道与日本文化的性格

崔世广

神道作为日本民族的固有宗教，与日本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它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文化一起生长，一起发展，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离开神道恐怕难以谈论日本文化；另一方面，其作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对日本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了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规定着日本文化的基本性格。本文试对神道与日本文化的关系，神道对日本文化性格的影响做些粗浅探讨。

一、“日本式原理”与神道

广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的体系，其包括自然风土、社会结构、宗教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尽管文化有不同层次，又有各种表现形式，但这些层次和表现形式不是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而是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而存在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某种统一的原理和精神。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文化也才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性。可以说，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讨和解明日本文化的原理和特性。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中，明确指出了日本文化中“日本式原理”的存在。她在列举了日本人行动中的一系列矛盾现象后，认为在日本人存在着从西欧人的基准来看完全矛盾的诸要素，但是，日本人对这些并不感到矛盾，而是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她说：“西方人所理解的德和恶与日本人所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教。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¹在这里，她指出了存在于日本文化中的统一意志、统一原理，并把探讨日本式原理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研究，她认为日本社会的原理是“集团主义”，日本文化具有“耻感文化”的特性。

与本尼迪克特不同，贝拉则开辟了从宗教角度探讨日本式原理的道路。在贝拉那里，日本式原理被视为广义的“神道原理”。贝拉在谈及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特色时这样说道：“神道虽然不是表现所有日本文化的东西，但在基本层次上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深刻关联。”²他在《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以及《宗教伦理与日本的现代化》等著作中，不是将神道、佛教、儒教分别来把握，而是富有见地地将日本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指出了日本宗教中存在着统一原理，即神道的原理。在日本，从所谓民俗宗教到民间信仰，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容与样式的宗教，如神道、佛教、儒教、道教等，而且神道、佛教中也有很多教派。但是贝拉认为，尽管在这些宗教中有各自固有的意义，诸宗教相互也有差异，但是可以将这些统合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宗教”这一概念中来论述，因为它们具有同质性。“所有重要的宗教传统均表现在国家及家庭宗教中，几乎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儒教和神道借用了佛教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成分；佛教和神道则借用了儒教伦理的许多东西；儒教和佛教则被彻底日本化了。”³

¹ 「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² 「日」堀一郎编：《日本の宗教》，原书房2005年版，第4页。

³ 「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4页。

在日本思想史研究家源了圆那里，也有着同样的见解。源了圆指出：宗教在民族性的形成上关系甚大。在宗教当中，又有民族宗教——从某一民族中自然产生的宗教，和世界宗教——超越民族差异和国境而传播的宗教。神道在接受佛教、儒教、基督教之后仍然一脉相承、绵延生长，其既吸收带有普遍性的教说，又脱胎换骨直至当今仍生存于日本人当中，这种连续性实在令人惊叹。“当我们考察日本对佛教、儒教的接受方式和儒、佛在日本的变貌时，就会知道，也许是‘神道式的’东西作为无意识的民族心理在其中发挥了某种作用。”⁴

上述大家的研究表明，越是人们在无意识中自然产生的文化，其不可变的程度越高。神道是日本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日本文化的形成期，固有神道的基本性格或许已经形成了。神道这种固有民族宗教，反映着日本人与自然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文化，在以后的日本文化发展中，起着整合、统合民族性格乃至文化性格的作用。

神道的这种文化整合或统合作用，可以从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看得出来。到现在为止，神道已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大体经过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几个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广为人知的神佛融合、神儒融合的历史现象。但正如石田一良所指出的那样，神道恰如“换穿衣裳的偶人”，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装扮，但其基本原理却顽强保留了下来。在外来文化势力强大时，就改变自己的打扮，披上新的外衣，但一旦风头过后，又会以新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势力。因此，在以后日本文化的发展中，神道的原理成为日本宗教的原理，进而成为规定日本文化的原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贝拉也认为，作为日本文化的潜在意志的神道，规定着日本文化的一般性格。这也反映到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一般认为日本人在世界上是最多借用外来文化而成长起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甚至可以说日本人比其他的任何国民都没有借用他国的文化。那是固有文化，这是借用（受容）文化，像这样强烈、而且长期地拥有这种记忆的社会，在日本以外并不多见。在日本强烈地意识着广义上的‘日本式的东西’（漠然意义上的神道式东西）与‘外来文化的东西’的区别。”⁶

神道之所以有这样的神奇作用，其原因之一在于神道乃扎根于日本风土的宗教。和辻哲郎在其名著《风土》中，曾用风土的结构解释文化的不同，指出季风、牧场、沙漠是世界主要的风土结构，而特殊的季风形态决定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性格。⁷但是，和辻哲郎风土论的最大缺陷与其说在于忽视了风土的历史的一面，不如说忽视了从内部结构的视点考察风土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和辻哲郎并没有深入到日本风土的内部，来考察日本的风土结构以及其与日本人、日本文化性格的关系，因而欠缺说服力。只有将外部和内部的视点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把握日本风土与神道基本性格的关系。

日本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周围有寒流与暖流经过；但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危害。这样的风土环境，是古代日本人产生神道信仰的基础。郁郁葱葱的森林，湍急的河流，突发的火山爆发，突如其来的台风等，在对日本人的生活带来影响的同时，促使日本人形成

⁴ 「日」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性格的形成》，郭连友、漆红译，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⁵ 「日」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许极燊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

⁶ 「日」堀一郎编：《日本の宗教》，原书房2005年版，第4页。

⁷ 参见和辻哲郎《风土》，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了神灵观念。在古代，日本人看到怪异的东西，就视为神灵，加以膜拜。日本有八百万神之说，这些神大都是自然神。可以说，神道的产生是扎根于日本人的万物有灵论的神灵感觉的。

另外，神道的产生与农耕社会生活也息息相关。进入弥生时代后，日本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水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耕生活的共同体，在为祈求神灵保护农业丰收及丰收后答谢神灵恩惠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了原始神道。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神道也与农耕社会生活相结合，具有了祖先崇拜和农耕仪礼的内容。现在，日本神道中保留的许多农耕仪式都是水稻农耕传入以后才形成的。而且，随着地域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形成，神道也拥有了强烈的共同体主义的性质。正因为神道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也才能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一边吸收外来文化，一边不断成长而延续下来，并承担延续民族文化基因，并改造外来文化的任务。

也就是说，神道既是自然发生的宗教，也是“农耕共同体的宗教”。这种共同体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人与社会的共同体，还是人与神灵的共同体。即神道是将自然、社会、神灵融为一体的宗教。这种与日本的风土、历史、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神道，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成为了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日本文化的潜在意志，规定着日本文化的特性。

二、神道与日本文化的个别主义性格

日本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可以说是特殊主义，或者说个别主义，这与神道有着内在联系。众所周知，神道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没有绝对者，没有经典，没有教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道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原理。恰恰相反，神道有着自己的强韧的原理，而这种原理之一就是与普遍性相对的个别主义，或曰特殊主义。

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说，“正如和辻哲郎所分析的那样，日本神话里被祭祀的神，同时又是进行祭祀的神，无论追溯到哪个世代都具有这样的性格，而祭祀的终极对象却消失在茫茫的时空之中。在这种‘信仰’里，并不存在一切具有普遍性的宗教所具有的那种始祖和经典”。他接着说，“‘神道’可以说像一个毫无内容而不断延长的空白布筒，它是用每个时代强有力的宗教‘习合’来填充其教义内容的。毋庸置疑，神道的这种‘无限拥抱’性和思想杂居性，集中地体现了上述日本思想的‘传统’。正因为它没有绝对者，又没有以独特的方式形成对世界进行逻辑性、规范性整合的‘道’，所以对外来意识形态的感染也无抵御的装备。”⁸ 在这里，丸山真男精辟地指出了神道的非普遍主义、非超越主义性格。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文化中虽然没有类似于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存在的“道”，却拥有个别主义的、特殊主义的“道”，并由之形成了日本的“道文化”。如所周知，与缺乏严密的世界观体系的事实相对应，在日本传统社会却形成了将某种观念和思想与具体技艺相结合的“道”，如茶道、花道、武士道、书道、画道、香道等。这些道在基本的精神方面与神道是相通的，如其具体性、封闭性，寓复杂于简单之中，即现实又超现实等等，恰恰是神道为日本的道文化的形成准备了一般性基础。

茶道是在随着一定的作法而饮茶的过程中，达到主人与客人之心的共感与交

⁸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页。

流的日本传统生活艺术。由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首创，至千利休集大成。在茶道中，将称作抹茶的粉末状的精制茶叶放入茶碗，注入热水，以茶钱搅拌使其起沫而饮。茶道的礼法由为此制造的有观赏价值的茶碗、点出香味浓郁的茶而劝客人饮用的方法和客人饮用的体会而组成。在茶道的礼法中，可以看到武士的礼法和能的影响。与形相比更重视心，无我待客被称为茶道之心。茶道融入了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社会人际关系等因素在内，是适合日本社会文化风土的综合体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茶道的真髓在于，主客通过共同欣赏和享受茶道艺术，达到心的融合，从而形成和睦的人际关系。

花道是使用剪下的鲜花，按照一定的意念构思，加以精巧组合插入器皿内的传统生活艺术，兴盛于16世纪左右。初期的花道，重视自然本来的素材和姿态，后逐渐发展为虽然使用自然的素材，但却加上构成的理念意义。花道的基干为天（宇宙）、地（地球）和人，这些表现了能保持调和的大自然。作为花道的基本技术，有将素材定着于花器的方法，将多余的枝叶剪掉的方法，素材弯曲及纠正弯曲的方法等造型上的技法，还有着着眼于植物生理上的技法等。但是，通过学习和掌握具体的插花技术，加强人的修养，致力于人的形成，则是花道之为花道的根本所在。

武士道不同于茶道和花道。它不是一种生活艺术，而是一种武士阶级的道德体系。武士道发源于镰仓时代，于江户时代吸收了儒家思想而形成。其特点是重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清白、质朴、简约、尚武、名誉、情爱等。在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专以战斗为职业的时代，赞扬死的思考方式在武士道中占有很大比重。这延续到江户时代，“武士道即是死”的思想，是武士道整个体系中一部分人的思考方式。武士道的特征之一是尚武、名誉，即战胜对手。但胜利并不是单纯以力量压倒他人，也包含着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对手的精神结构上的磨炼，强大正是在战胜自己时形成的。这是从精神上压倒对手，让他人高看自己一眼的精神高大的表现。作为这种精神强大的一部分，礼仪受到重视。在重视精神修养和磨炼，重视礼仪这一点上，武士道与其他生活艺术的诸道又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实际上，除了以上的各种“道”以外，还存在诸如剑道、柔道、空手道，甚至还有“扫除道”、“明信片道”、“豆腐道”等。也就是说，只要某种活动、行为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了一定的内容、仪式和精神内涵，都可以上升为道。每个领域都可以有自己的“道”，但这些“道”又都是个别主义的，具有封闭性，而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各种各样的“道”并不志向于一般性、超越性的观念和理论，而是将精神性、规范性融于具体事物中，重视仪式性、感受性，这与神道有着相通之处。例如，与中国儒教具有普遍性格不同，武士道归根到底是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在武士道之外，还存在着作为町人阶级规范的町人道，作为农民阶级规范的农民道。

日本文化的个别主义特性，也体现在日本人的自然观和社会观中。日本语言学家大野晋指出，日本没有产生相当于“自然”一词的日语。源了圆认为，“也许，被分割成小块的自然景观也阻碍了超越自然物的‘自然观’的形成。对日本人而言的自然是一座座山川，一条条河流，是一棵棵树木，一丛丛绿草，没能形成超越这些自然物的自然观。日本人没有去设想某种抽象、普遍的形而上学的实体的存在，而是一个个的自然物结成个别主义式的关系，形成了客观地看待事物的性格。”⁹

⁹ 「日」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性格的形成》，郭连友、漆红译，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另外，就日本社会而言，也有着浓厚的个别主义色彩。在日本，各种共同体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而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共同体的起点是家，诸多家共同体组成村落共同体，诸多村落共同体组成国家共同体。从原则上讲，国家是包摄所有共同体（家、村）的最大共同体，是日本人共同性、公共性的终点，是日本人人生意义的最终保证。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被包摄的共同体（家、村）也有其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根据，而且是共同体成员追求个人利益、实现人生意义的最直接的场所。因此，共同体成员的日常效忠和献身的对象并不是指向国家，而是指向家、村（工作场所）等个别主义的共同体。

诚如贝拉所言：“神道虽然不是表现所有日本文化的东西，但在基本层次上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深刻关联。在这里，与其说是普遍的，不如说个别主义的性格很强。在各个村子里有固有的神道，在所有的集团中又有各个集团固有的排他性的独特的‘神道’，这恰如国家的天皇制反映到日本社会的所有方面的各种小天皇制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¹⁰在日本神话中有“八百万神”的说法，神道的神是极多的。但诸神之间既不是毫无关系，也不是互相平等的，而是按血统关系等形成主从关系。天上众神的主神是天照大神，由其统帅其他神，现实中的有名的家族，也都能在神话的众神中找到其渊源。也就是说，神道中的个别主义原理影响到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深蒂固。

神道扎根于日本的自然与风土、以及社会的特殊结构之上。因此，日本文化中缺少中国、西方文化中的那种普遍主义性格。日本之所以对异民族的文化表现得比较宽容，很大原因在于日本神道具有非排他性、非绝对性的特征。而异民族文化进来之后，之所以没能征服日本人的这种传统精神，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它没能动摇与日本基层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道信仰。

三、神道与日本文化的现实主义性格

如果从圣与俗、神与人的关系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日本文化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也与神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都形成了各自特定的圣与俗、神与人的关系模式。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各民族形成的神人关系结构却是不同的。

如所周知，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部，是一个由4个大岛和若干小岛组成、孤立于海上的岛国。其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地表崎岖，山脉纵横，国土面积的70%是山地，平原和低地仅占陆地面积的25%，既没有大平原，也没有大草原，更没有大沙漠。日本的气候属于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虽然南北存在较大差异，但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四季变化分明。日本全国降雨量充沛，气候湿润，这不仅孕育出了茂密、生机勃勃的森林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而且对水稻等农作物的生长也较为有利。总之，日本虽然有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但仍不失为风景优美，适合人类生存的一块宝地。进入农耕社会后，日本人就在一块块封闭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相互协作的农耕共同体。他们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中，过着以稻作农耕为主的共同体生活。

在上面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宗教——神道，其规定着日本文化中人与神灵的关系。首先，由于没有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日本所产生的神不具有神教世界的神所具有的绝对支配、威严无比的性格，而是相对的、慈和的、具体的、有人情味的。如日本民族的祖先神

¹⁰「日」堀一郎编：《日本の宗教》，原书房2005年版，第4页。

天照大神就为女性。其次，日本所产生的神不是与人隔绝的，而是具体的、共同体的神。共同体的神灵是共同体成员的祖先，现实中的共同体成员则是共同体神灵的展现。他们是相互对应、相互依赖的关系。如家共同体有祖先神，村落共同体有氏神，国家共同体有皇祖皇灵。再次，由于神和人的意志是一致的，所以神的意志不过是现实中共同体利益的神格化。一方面，现实中对共同体利益的追求和获得乃是对神灵的奉献，并且是共同体神灵有灵验的证明；另一方面，共同体神灵的功能也是赋予生命力，帮助和促进生产和成长，而不是灵魂救济和实现理想。

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最初出现的是生命力本身。像苇芽那样有力地萌生出来的东西成了神，国土、山川草木以及人的形成过程都是神的生殖过程。在日本人看来，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按照本居宣长的说法，古代日本所谓的神，是不管山川草木、鸟兽鱼虫还是人，凡有不寻常之处的都是神。神产生了人以及周围的动植物的生命，祭祀则是确认这种生命力量的更新和增长的宗教仪式。因此，日本人对神的祈愿只是有关生产的丰收、生活的繁荣和幸福等极为现实和世俗的事情，而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和来世的灵魂得救等。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最大目标或理想是共同体的繁荣，不洁或罪是从外部附着、感染的，而不是来自于共同体的神灵本身的（没有原罪观念），而且是可以透过宗教仪式被除掉的。这样的神人关系的特点，决定了日本人的生活态度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色彩。

在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等，其基本指向应该说是来世主义的。但是，在神道中基本上不谈论死，因此有人说神道是关于生的宗教。古神道的人生观之一大特征，就是不把现世以外的高天原、常世视为优越的世界，不给予它们超过现世的价值，也不去美化死后的世界，只有现世才是过去、现在、未来之中最有价值的。在日本的神祇信仰中，虽然有以清静、正直之心向神祈愿这样的朴素信仰，但是没有很强的思想上的证明，唯有现象世界才会被优先考虑。

神道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近代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我们日本没有哲学”，此话不假。通观日本有文字以来的前近代历史，就会发现，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没有出现过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当然，缺乏理论性、体系性的神道思想不是哲学体系，甚至连日本神话中关于宇宙生成的内容，据认为也是受了中国思想的影响。产生于18世纪的安藤昌益的乌托邦思想，也是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影响，而且在其产生后即遭埋没、被遗忘，也说明其缺乏社会思想基础。以上这些，应该都与神道的现实主义文化态度有关。

神道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也规定着日本移植、改造外来文化的基调。日本人在将大陆的佛教移植到日本后，进一步按照日本的风土人情，按照日本人的生活原理加以改造。到镰仓时代后，佛教世俗化，来世主义的佛教被改造成为现世主义的佛教。结果是以解决了死的问题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肯定了现世生活。在日本，不仅和尚可以娶妻生子，食肉饮酒，过俗人的生活，而且人人均可成佛，佛教完全世俗化、日本化了。与此有关，现在的大多数日本人也不太考虑未来，不相信转世和来世的理论，他们可以说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多数日本人认为，现实世界就是神的展现，没有必要再想象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充实地度过一生就是人生的最大意义。他们也根本不考虑死后上天堂或者入地狱的问题，不上天，不入地，墓地就是永久的居住地，但灵魂仍活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仍是日本人的主要世界观。

对儒教的改造也是如此，经过改造后的儒教，不仅抛弃或不再追求抽象的、思辨的世界观，而且将其伦理道德规范变为了适合等级序列主从关系的共同体主义社会结构的东西，对人的情欲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儒教变为了与日本人的基本生活原理相一致、日本式的东西了。到江户时代，日本人虽然吸收了具有很强思辨性的朱子学的形而上学，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将其改变成了不喜好思辨性形而上学的东西，而具有了偏重现实现象、经验、实证方面的“客观主义”的倾向。而且，开始对于人的情感方面表现得非常宽容。

对基督教的移植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战国时代起，基督教虽曾一度在日本得到传播，但一旦判明基督教是与日本人的信仰、生活原理和社会结构格格不入的时候，基督教就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在近世终于灭绝。总之，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移植和改造是有着一定之规的。这个“规”，就是日本的固有神道文化、固有的现实主义生活原理。

总之，神道的最大关心在于现实世界的生生不息，共同体的繁荣和成长，而不是来世的问题。我们认为，“君王的朝代，一千代、八千代、无尽期，直等到小石变成巨岩，岩石上长满藓苔衣”。这一选自《古今集贺歌》的日本国歌歌词，如实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关怀的特性。桑原武夫也说，“在日本常民的世界，平稳平安地度过一生被当做理想。”¹¹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描绘了普通日本人的现实主义追求。以神道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化，在今天的日本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原文载《神道与日本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¹¹ 「日」桑原武夫：《遠野物語 山の人生 解説》，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320页。